

舒群，划破暗夜长空的闪电

■王宏波

舒群，是划破哈尔滨暗夜长空的一道闪电。在20世纪30年代，舒群受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在哈尔滨组织领导的“东北作家群”，以笔为武器和日伪势力开展了文化思想战线的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王道文化”，给日伪恐怖统治下黑夜沉沉的哈尔滨，给血肉腥风的东北，送去了浴血奋战追求民族解放的无限光明。

舒群，在我的心中是一座不朽的雕像。

(一)

这些年，我每到北京都要会晤舒群的外孙、著名集邮家刘佳维，每次话题都要谈到他的舅舅舒群。

舒群——中国现代作家、东北作家群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原名李书堂，曾用名李春阳、李旭东、李凤文、李郁哲，笔名黑人、舒群。

舒群1913年9月20日出生于阿城县一个工人家庭。1920年，在他七岁时被送到阿城县西营小学读一年级，十五岁时报考了哈尔滨一中。据刘佳维在《六十年风雨忍辱负重，半世纪书剑激励后人》一文中介绍：“在五百多名考生中，录取80名，他考了第八名，编入俄语班，遗憾的是只读了两个月，因交不起伙食费，被取消了学籍。”他回到一面坡，为帮助父母持家，便每天上山砍柴背到山下集市卖。在这里他结识了从日本殖民地朝鲜流浪来的朝鲜孩子果里（即舒群的著名作品《没有祖国的孩子》中的主人公果里的生活原型），两人成了好朋友。在果里的引荐下，舒群认识了设在一面坡的中东铁路苏联第十一子弟中学的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即舒群的著名作品《我的女教师》中的主人公里苏多娃的生活原型），她介绍舒群进入这所中学读书。在这里他第一次看到列宁、斯大林的画像，知道了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高尔基等著名作家，使他产生了对民族自由的向往和追求。周云谢克列娃送他一本通俗的共产主义读本和一本“七人”编著的俄文语法书。后来舒群说：“她不仅是自己的文化老师、第一个政治老师，而且也是指引自己走上革命文学道路的老师。”

(二)

在一个隆冬大雪飘飞的日子，我驱车来到他的家乡阿城县（现已为哈尔滨市阿城区），参观了舒群革命文学纪念馆。

在这里，我看到了舒群在与日本侵略者进行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的身影。

1930年，舒群考入青岛海军学校分校——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在这里他认识了后来成为东北抗日联军著名领导者的冯仲云，开始对中国共产党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

1931年，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舒群辞掉了月薪六十元的翻译工作，怀着满腔为国赴死的决心，参加了曾任哈尔滨第一中学校军事教官车凌云组织的抗日义勇军，转战松花江两岸。1932年3月，在哈尔滨经中共地下党员陈士卿介绍，他参加了第三国际中国组，不久又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一年底，他被任命为第三国际济南情报站站长。据《舒群年谱》介绍：“那时，第三国际中国情报站在中国东北实行的是单线领导，他负责搜集交换情报，工作十分困难和危险”，但他以《五日画报》分销处的名义为掩护，从事情报的传递，圆满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在东北十四年的艰苦抗战中，始终是武装斗争和文化斗争相伴而行，东北抗日联军在“铁岭绝岩，林木丛生，暴雨狂风”中，“起来呀！起来呀！”迎接“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而“热血踏破兴安万重山，奋斗啊重任在肩，突封锁破重围曙光至”浴血奋战的同时，在文化战线则活跃着一支不拿枪的“东北抗日联军”——东北作家群，他们以笔为武器，发出了要把日本侵略者的“黑暗一扫光”之“伟志兮”的战斗誓言，向东北民众发出了“精诚奋发横扫贼江原，民族各阶级团结起，夺回我河山”的召唤。

舒群按党的要求“由武转文”，开始从事组织领导东北革命文艺工作，培养了一批具有进步倾向的青年作家、诗人、戏剧表演家，使哈尔滨成为“东北作家群”成长的“摇篮”，率先在东北举起了抗战文学的旗帜。

1931年春天，中共哈尔滨地下市委创办了《哈尔滨新报》。舒群在《哈尔滨新报》文学副刊《新潮》发表文学作品，并被聘为通讯员。他还在《国际协报》《哈尔滨商报》《大同报》《哈尔滨画报》等文学副刊上发表散文、诗歌等。因他肤色较黑，便给自己起了一个非常有趣味的笔名——黑人。据《舒群同志生平》介绍：“他发表了大量的具有进步思想内容的诗歌、散文等作品。这些作品，有的揭露了日伪反动统治者的残暴和黑暗；有的反映了下层劳动人民的苦难，也有的展现了进步知识青年的爱国热情和为祖国沦丧的苦闷心情，表现了舒群的敏锐和热诚。”

舒群和罗烽、金剑啸、姜椿芳等积极团结左翼作家、艺术家，经常在哈尔滨市道里区新城大街（今尚志大街）南端、道里菜市场西南角不远处（今中国网通营业厅附近）那座独门独院的木结构俄式平房聚会。

这里是进步诗人、画家、音乐家冯咏秋的家。因他们夫妇在房前屋后种满了牵牛花，每年夏秋两季，绿油油的叶子和藤茎沿着墙壁爬满房顶，竞相争艳的牵牛花飘逸着馨香，整个庭院幽雅静谧，朋友们给这里取了一个诗意的名字——“牵牛坊”。

2019年5月24日，我在一次文化活动中见到冯咏秋的儿子——著名的画家、作家、新闻记者冯羽冯先生，我向他谈起舒群，他说：我父母以前多次讲过，那时舒群经常组织进步的文学青年来我家，举办文学和艺术沙龙。

在这里他以不同的方式传达满洲省委和哈尔滨市委的对敌方针，指示、渗透党的思想理论和路线，以新的意识和观念武装这些青年的头脑，使他们走上革命道路，形成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广泛影响的东



北作家群，以犀利的文学之声向日本侵略者发出了战斗的呐喊，开辟了具有东北特色、书写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的文学之路。

1932年秋天，松花江洪水冲破江堤，哈尔滨市一片汪洋。这时一位叫张通莹的女子被困在道外东兴顺旅馆，她给《国际协报》副刊写了一封求救信，她就是日后的萧红。据赵凤翔在《萧红与舒群》中说：“舒群当时只有十九岁，是一个朴实憨厚的青年，他听说一个青年女子落了难，见义勇为，用组织上发给他的出差生活费，给萧红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那时大水早已漫过了头顶，舒群就把这些东西捆在脑袋上，游泳来到了旅馆。”不久，在萧军的帮助下萧红得以解脱。当“二萧”在哈尔滨文坛崭露头角后，舒群把在第三国际工作时节省下来的生活费、差旅费40元，交给萧军，并和《五日画报》社协商暂欠一部分印刷费，帮助萧军、萧红出版了第一本小说集《跋涉》。萧军在这本书的后记上写到：“这个集子能印出，我只有默记黑兄弟（舒群）和幼宾兄的助力”。

1932年11月的一天，在吉林磐石开展抗日游击斗争的傅天飞潜回哈尔滨，在舒群暂住的《哈尔滨商报》报馆宿舍，详细讲述了满洲省委代理军委书记杨靖宇在南满开辟抗日游击区，神出鬼没打击日本侵略

者的英勇事迹，并庄严地把自己要以创作长篇小说的“腹稿”也向舒群做了详细的交待。他说：“咱两人，两份腹稿，这样保险，万一你我哪一个……将来总剩一个人，一份腹稿……”而舒群也早把生死置之度外，随时准备为了民族解放而牺牲，他又向萧军、萧红做了详细转述，还把傅天飞请到“二萧”的家里，再一次做了详细复述……

(三)

在春光明媚4月的一天，我来到青岛匆匆赶到观象一路1号，这是一处居高临下的德式庭院，以花岗岩为基，现只是一栋普通民居，窄窄的门口黑色的铁栅栏紧锁，透过栅栏可见左面是十几级石阶，拾阶而上才可进入院内。通过当地的朋友介绍，我怀着一种仰慕踏进这座二层红瓦黄墙的小楼，在这里又一次感受到舒群强烈的革命信仰。

1934年初，满洲省委地下党组织遭受严重破坏，哈尔滨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舒群参加第三国际情报站的身份被暴露，同时他与党的组织又失去了联系。为了躲避日伪当局的追捕，他来到一面坡住在二姐家里。

这些天，舒群和二姐夫刘文烈冒着凛冽的朔风，蹬着没膝深的积雪进到帽儿山的大森林，向在这里伐木的林业工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发动林业工人参加抗日活动。二姐夫也成了抗联的堡垒户，二姐夫刘文烈成为抗联的交通员，为山上抗联送情报运物资，两次被日本鬼子抓住，最后一次被日本宪兵活活打死。

舒群于3月回到哈尔滨，因怕被敌人发现，未能跟家里的亲人告别。他的次子李霄明在《尘封往事》一文中说：“临行前父亲找来他的二弟，带回一封给父母的信，算是告知。这一走，竟是父亲和祖父的永别。”他在友人的帮助下经大连来到青岛。

当年为什么选择去青岛？李霄明说：“主要是青岛有他在哈尔滨商船学校上学时的同学接应，又加之青



岛是北洋军阀余部所统治，德、日帝国主义势力在此地也很大，国民党的特务组织“蓝衣社”也只能半公开活动，所以东北逃亡青年和革命者，都以青岛为避风港。”

舒群到青岛后，由哈尔滨东北商船学校高他两级的同学高嵩（时任中共青岛市委书记）介绍，与青岛地下党组织接上了组织关系并被安排在中共青岛市委主办的《磊报》做编辑工作。《磊报》的兼任主编倪鲁平（时任中共青岛市委组织部长）和舒群一见如故，便把自己的妹妹倪晋华介绍给他，并于1934年5月4日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婚礼。

舒群在自己刚刚稳定后便马上给仍在“荆天棘地”哈尔滨的“二萧”写信，于6月15日三人在青岛再次相聚。

舒群、倪晋华和萧军、萧红这两对夫妻开始住在青岛四方村70号倪家，后来倪鲁平在观象一路租下1号这幢小楼。楼下有两个房间，楼上有五个房间，分为两个独立套间，各有门口楼道。楼上靠右侧的一套，是萧军、萧红的住处，楼下两间是舒群、倪晋华的住处。在这里“二萧”没有忘记“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傅天飞那番“全是很沉痛的谈话”，二人以此分别创作了那两篇称为“现在需要的是斗争的文学”的《八月的乡村》和《生死场》，特别是《八月的

乡村》直接描写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武装与日本侵略者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战争场景与现实生活，正如鲁迅所指出的这两部作品着重表现了“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填补了中国近代和现代反帝反殖民文学缺失直接尖锐的战争描写的空白，树立了中国现代抗战文学的第一面血染的旗帜。

而此时的舒群又全力投入到党的地下工作。1934年9月，中共青岛市委出了内奸，国民党特务组织“蓝衣社”在青岛全市进行了大搜捕，高嵩、倪鲁平和舒群夫妇等多人被捕。在冰冷的牢房，他创作了后来被誉为“五四”后优秀文学作品之一、“国防文学”的代表作”（见作家出版社2013年出版《舒群年谱》）的短篇小说《没有祖国的孩子》。

1935年春，舒群出狱，几经周折从青岛来到上海。在上海又对作品进行了修订并最终定稿，1936年在傅东华主编的《文学》期刊一经发表，立刻在广大读者中特别是在文艺界引起了强烈反响。周扬在1936年《光明》杂志第一卷第2号《现阶段的文学》一文中，对《没有祖国的孩子》的时代意义给与了充分肯定：“失去了土地，没有祖国的人们，这种种的主题，在目前有着特别的意义。最近露面的新进作家舒群，就是亡他的健康而朴素的风格，描写了很少被人注意的亡国孩子的故事，和正在被侵略中的为我们所遗忘了的蒙古同胞的生活和挣扎，而得到成功的新鲜效果，成为我们的一个重要期待。”周立波也在《1936年小说创作的回顾——丰饶的一年》中，对《没有祖国的孩子》给予了思想性与艺术性赞许和肯定：“舒群《没有祖国的孩子》在艺术成就上和反映时代深度上，都超越了文学的一般标准。”后来，这篇作品被文艺理论和批评界誉为“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品并被翻译成俄、英、日等多种文字。

舒群参加了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陆续创作了小说《蒙古之夜》《邻居》《回到哈尔滨去做人》《北风送来的



呼声》《跟踪的步子》《奴隶与主人》《舰上》《老兵》《秘密的故事》等大量反映民族矛盾、政治对抗、军事冲突、敌我斗争重要题材的文学作品。

(四)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他担任了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兼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参加了著名的平型关战役。1938年2月，任弼时派他去武汉，与丁玲共同创办了《战地》，参与集体创作了话剧《台儿庄》《总动员》，在《广西日报》副刊等发表了大量的散文和小说。

1940年至1945年间，舒群在延安担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按照毛主席要把“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的要求，每月要编几十万字的副刊；另一方面，在“鲁艺”要进行日常的教学。他经常能够和毛主席近距离地接触。因此对于文化工作上的事情，毛主席会经常听取他的意见。他在“1942年春，参与协助毛泽东同志筹备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见《舒群同志生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提出“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斗争方针，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并开辟东北的革命文艺工作，按照中央的要求，于9月2日一早，舒群率领由董蒙、田方、于蓝、欧阳秋、陈凡、王大化、雷加、张松如、华君武、刘炽、严文井、王家乙、陈强、谢挺



宇等38人组成的第八中队奔赴东北。

舒群回到了他阔别12年的哈尔滨。

2019年5月6日下午，我在哈尔滨市采访了舒群的外甥女，时年已85岁的刘松坡老人。

她深情地向我说起自己的舅舅舒群。

舒群来到东北后，先后建立了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接管了伪满的《新满洲》《麒麟》《新民画报》杂志和书店、剧团等敌伪文化机构，创办了《知识》杂志，特别是1946年初在长春接管了日伪于1937年建立的“株式会社满洲映画协会”，后转移到黑龙江省的兴山（今鹤岗市）创办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并任厂长，组织拍摄了第一部新闻纪录片《民主东北》，第一部故事片《留下他打老蒋》，第一部木偶片《皇帝梦》，第一部动画片《瓮中捉鳖》，并组织安排翻译制作《伏尔加，伏尔加》《快乐的人们》《十月革命导师列宁》《普通一兵》等一批苏联的新电影，获得了观众的欢迎和喜爱。今年3月9日东北抗联著名将领李兆麟在哈尔滨遭国民党特务暗杀后，舒群火速派人赶到哈尔滨，抢拍了纪录片《抗日名将李兆麟遇刺身亡》，在长春和哈尔滨等地放映后引起强烈的反响。同年他出任中共东北局宣传部文委副主任、东北文联副主席，受东北局党组织委派联络张学思、白希清组建东北大学并担任副校长。

1949年前后，他在鞍山钢铁公司做党的工作，创作了长篇小说《这一代人》。1950年他奔赴抗美援朝战场，深入战斗一线采访，写作了通讯《天上地下》发表在《人民日报》上。1951年回国后又创作了长篇小说《第三战役》。担任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秘书长，抱着“学习试做试新”“歌颂党及其领袖毛泽东同志”的目的，开始创作以毛泽东为物核心，旨在塑造领袖毛泽东伟大形象的小说《杨家岭夜话》。可惜这部原稿在“文化大革命”中遗失，但他坚守信念和初心，1982年在哈尔滨的亲属家，坐在小板凳上，伏在床边又重新创作并改名为《毛泽东故事》。同时，他还对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进行勘误，出版了《中国杂技史料》，撰写了《中国话本书目》等著作……

(五)

今天，我走在春日的阳光中。

我在哈尔滨一些老街区那百余年的老榆树下，在几经沧桑的老建筑旁，在一些小街小巷里，我在寻找什么？是在寻找当年舒群的踪影……渐渐我的眼前矗立起一个“略高的身材，宽阔的前额，深邃的眼睛，面孔黝黑而清瘦”的舒群形象。

你好，舒群——我的文学前辈！

2021.3.22

注：近日，从舒群次子李霄明、外孙刘佳维二位先生处得知：为纪念这位抗战作家，《舒群全集》（1—8卷）编募已告罄，将由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向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献礼。

此文在山东省散文学会、中国吴伯箫散文研究会举办的“华成杯”第二届吴伯箫散文奖全国散文新作品大赛中荣获“吴伯箫散文奖特别荣誉奖”。

怀念我的老班长——苏宁

面，把危险留给自己。这时，蜂群已盘旋到我们上方，“嗡嗡”像过飞机一般。苏宁轻声说道：“千万别动！”我们就这样抱头趴着，直到听不见蜂群的嗡嗡，苏宁才把我们拉了起来。

回来后，听房东说，这是东北大马蜂，毒性很厉害，能蛰死人。

1970年8月，我们的老班长到哈尔滨医科大学学习去了，苏宁先是代理班长，很快就转正。此后，部队进行大规模陆空演习。在苏宁的带领下，我们班各项任务都完成得很出色，年底被评为“先进班”，5个人全部被评为“五好战士”，这种“满堂红”的情况当时很少见。

1970年11月，部队野营拉练。第一天傍晚，我们在阿城县郝骡屯宿营。住进老乡家后，我们先打扫了院子。正要挑水时，老乡把扁担藏了起来，说：“你们走了一天很累，不能再挑水了。”苏宁发现房梁上有根扁担，就拿了下来。水桶装满，挂上扁担，使劲儿一挑，“啪”的一声，扁担断成了两节。原来这根扁担已有裂痕，房东放起来不用了。苏宁还是拿出线，赔偿给老乡。老乡坚决不要，说：“扁担本就是坏的，不应该赔钱。”苏宁说：“部队有‘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损坏东西就要赔偿。”老乡就是不收钱。我们走的时候，苏宁悄悄给老乡留下了5元钱。

1971年冬天，部队在五常县的乡下进行军事训练。我们白天练习火炮操作，晚上要站岗放哨。两个人一班，每人一小时。当时我和苏宁是一个班次，我在我前面上哨。那天我感冒发烧，不能坚持站岗了，苏宁没有报告连里，替我站岗一个小时。东北的冬天非常寒冷，气温零下30多摄氏度，连着站岗两个小时，浑身都冻透了。苏宁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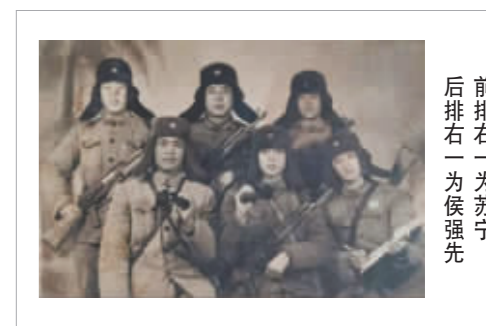
哨回到班里，我才猛然醒来。看着他的眉毛睫毛全都结满白霜，鼻子也冻红了，我很心疼，也很内疚。苏宁示意我不要说话，让我好好睡觉。第二天起床后，我马上报告连长，苏宁受到了表扬，我也非常感动。

不久，入伍仅两年多的苏宁，因工作成绩突出，被提拔为代理排长。1973年，我要回老家探亲。苏宁知道山东农村生活很困难，他住在城市经济条件好一些，就拿来几十斤全国粮票，塞到了我的包里。回到老家后，我用苏宁给的全国粮票买了一袋面粉，让家里老人吃上了难得一见的白面馒头。父亲对我说，苏宁肯定是个好人，是值得交的好朋友。

在苏宁的帮助和影响下，我入了党，提了干。1980年底，我被任命为二连连长。此前在一连担任副连长时，我负责阵地发射指挥，技术相对简单。担任连长后，就要负责射击指挥。射击指挥业务很复杂，也很难。这就需要有过硬的军事技术、果断的指挥能力和灵活的战术方法。所以，我必须尽快提升军事技术，才能胜任连长的职位，心里压力很大。

当时，苏宁升任团司令部侦察股股长，他清楚我的军事技术底子。为了让我尽快胜任，到了周末他不回连队家里，而是带着射击指挥板和训练资料，来到连队，手把手教我火炮射击指挥技术，帮助我在短时间内提升了指挥能力。此后，我指挥连队进行了多次火炮实弹射击，成绩均在良好以上。

我和苏宁在连队相处的三年时间里，一起学习，一起训练，也常在晚饭后散步谈心，苏宁传递给我的是满满的正能量，因此我的思想觉悟、政治水平、军事技术



前排右一为苏宁
后排右一为侯强先

等都提高得很快。我在部队的整个历程、每一次进步，都与苏宁老班长最初的帮助、鼓励和影响分不开。对此，我深感欣慰，也终身难忘。

2020年1月，我去了哈尔滨，回到了老营房。我和苏宁当年所在的老部队，已经换防调走，但现在驻防的部队，依然热情地接待了我，还陪着我参观了苏宁纪念馆。当我在照片上看着熟悉亲切的苏宁、聆听着苏宁动人的事迹时，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立刻泪流满面……

当时，我就决心把苏宁的事迹用一种形式表达出来。

今年是苏宁牺牲30周年，又逢建党100周年，我把和苏宁并肩战斗时的点点滴滴讲出来，缅怀英雄，悼念烈士，也实现了我多年的夙愿。

苏宁，我的老班长，我的老战友，我永远怀念你！

讲述人：侯强先 夏津县退休干部

记录整理：赵奎忠 夏津县退休干部



苏宁，生前系解放军某部团参谋长。1991年4月，组织部队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时，为保护战友光荣牺牲，年仅38岁。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努力国防现代化建设献身，用实际行动实现了自己的理想。树立了一位革命军人、共产党员、领导干部的光辉形象，是新时代广大官兵学习的好榜样。

苏宁，1993年中央军委授予“献身国防现代化的模范干部”荣誉称号。

2018年中央军委政治部印制“全军连以上部队悬挂画像的解放军8名著名英雄”之一。2021年7月1日被中共中央表彰为“100位重要英雄模范”。

“七一”之夜，我坐在电视机前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情景史诗《伟大征程》”。当“100位重要英雄模范名单”公布时，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苏宁。历历往事，又现眼前；深深怀念，顿涌心头。

思，就主动请他教我洗衣服。苏宁一边手把手教，一边对我讲，在部队要提高生活自理能力，要讲卫生，搞好团结，独立思考，做一名优秀的战士。他的言行，让我深受感动，深受教育。

1970年初，中苏关系紧张，部队从市区转移到山里去了，我们驻在阿城县沙河公社拔碾沟小山村里。春天，山上的雪融化了，草芽也生长了出来。一天上午，我和苏宁及房东家十四五岁的男孩，一起上山打柴。中午时分，在附近吃草的牛群突然四处狂奔，只听男孩高喊：“快跑快跑！老牛踩到马蜂窝了！”抬头一看，嘿！密密麻麻的蜂群席卷着几头牛，正朝着我们这个方向快速飞来。我们已经来不及了，面临着被马蜂蛰伤的危险。苏宁反应很快，他见前面有个被大雨冲成的浪窝，就迅速把男孩和我推到里头趴下，他却趴在在了后

1969年12月，我从山东省夏津县参军，来到驻防哈尔滨市的69师炮团二连，和苏宁成了同一个班的战友。苏宁是这年3月到二连的，比我早参军9个月。我和苏宁同吃、同住、同训练了三年时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回忆。

当时，16岁的苏宁已经是侦察班的计算兵，负责带我这个17岁的新兵。他来自城市家庭，见多识广，我来自农村，是个懵懂小子，虽然他比我还小一岁，但在学习、训练、生活各方面都给了我很多帮助，为我作出了表率，使我受益很多。

我参军前，上有父母、哥哥和姐姐，家务活基本不用我干。刚到部队，就要自己洗衣服，但总是洗不好。有时犯懒，不愿洗，就把衣服乱放乱塞。苏宁发现后，就悄悄帮我洗干净，叠整齐。接连几次，我感觉很不好意